

# 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之發展與衡鑑\*

吳中勤\*\*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解釋偏差行為的三個主要的社會心理學理論—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在測量上較少重視個人對偏差行為的預期獲益與損失評估歷程。實徵研究也較少在測量中考量負增強對偏差行為的正向影響，以及個人偏差行為對重要他人感受的影響評估（即社會損失評估）。本研究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與一般化緊張理論觀點，來建構社會獲益評估歷程的測量題項，分別捕捉到正增強與負增強對偏差行為的正向影響。同時，也根據社會控制理論的理論觀點，建構社會損失評估歷程的測量題項，捕捉到與重要他人的情感連結對偏差行為的抑制效果。本研究以八年級學生為對象，檢視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的信、效度。研究發現：（1）二階四因素社會益損評估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良好。（2）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歷程，包含「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3）社會損失評估歷程，則包含「依附同儕」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4）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是偏差行為的可能推力，但唯有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能成為抑制偏差行為的拉力。根據研究結果，未來研究除可進一步複驗此量表的信、效度外，也可考慮納入其它理論變項，檢視不同模式適於解釋觀察資料的程度。教學實務上，教師可同時針對社會獲益與社會損失的評估焦點，實施多元教學活動，以期削弱偏差行為的推力，增強抑制偏差行為的心理拉力。

**關鍵詞：**社會損失、社會獲益、偏差行為。

\* 本文修改自作者博士論文，該論文獲科技部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3-2420-H-006-011-DR

\*\* 通訊作者：吳中勤，e-mail: minin-72704@yahoo.com.tw。

DOI: 10.3966/172851862019050055004

## 壹、緒論

偏差行為是指青少年在行為表現有異並有害於他人，而該行為是由社會規範所界定，當個人表現出偏離社會規範，妨礙個人生活或危害到他人時，該行為表現就稱為偏差行為（吳中勤，2015）。我國青少年常見的偏差行為有，罵髒話或言語暴力、喝酒、被同學罵、瀏覽色情網站、作弊、毆打或傷害他人、翹課、抽菸、逃家、偷竊與自殺等（許春金、周文勇、蔡田木，1996；董旭英，2003；衛生福利部，2014）。

研究指出，偏差行為具有長期的持續性，超過半數的青少年，其偏差行為會持續到成年（Kempf-Leonard, Tracy, & Howell, 2001），並可能進而演變成犯罪行為，導致社會成本的浪費。國內研究結果顯示，我國青少年的偏差行為約在八到九年級時達到高峰，且會影響日後偏差行為的持續性（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呂豐足、洪千涵、白鎮福，2015；許春金、謝文彥、蔡田木、呂宜芬、游伊君，2016；潭子文、張楓明，2013；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檳，2017），Defoe、Dubas、Figner 與 van Aken（2015）的後設分析亦指出，相較於青少年晚期與成人期，處於青少年早期的國中學生，傾向冒更多的險，其中，又以14歲左右青少年的冒險程度最高（Burnett, Bault, Coricelli, & Blakemore, 2010），可見，探討該年齡層青少年對於從事偏差行為的賞罰評估歷程，有其重要性。但目前對於青少年選擇從事偏差行為的內在認知評估歷程的瞭解有限，且缺乏探究該歷程的有效工具，因此，編製一份有效的測量工具，據以瞭解青少年選擇從事偏差行為的內在認知評估歷程，兼具理論與實務的重要性。

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是解釋偏差行為重要的社會心理學理論觀點，三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促使」或「抑制」個人從事偏差行為的社會情境因素（Akers & Sellers, 2009）。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偏差同儕提供偏差行為的學習楷模，讓接觸偏差同儕的個人學習到偏差行為，並透過增強型塑個人對偏差行為的定義，使個人偏差行為持續出現，因此，接觸偏差同儕是導致偏差行為出現的主因（許春金、蔡田木、鄭凱寶，2012；Akers & Sellers, 2009; Pratt et al., 2010）。社會學習理論觀點受到了許多實徵研究結果的支持（Durkin, Wolfe, & Clark, 2005; Higgins & Tewksbury, 2007; Lilly, Cullen, & Ball, 2007; Pratt et al., 2010; Ward & Gryczynski, 2009）。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對個人具有正向價值的人事物，是導致個人從事偏差行為的增強因素，但偏差行為是否出現，仍需視個人對行為結果的預期酬賞與懲罰而定，當個人認為行為結果的預期酬賞高過懲罰帶來的損失，便可能從事偏差行為，相反的，當預期懲罰所帶來的損失高過預期酬賞，個人便較不可能從事偏差行為。

(Akers & Jensen, 2006)。然而，雖然社會學習理論觀點承認，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具有正增強與負增強的鼓舞作用，但實徵研究對增強的測量，多著重於正增強，較少測量負增強與懲罰的題項。更重要的是，根據社會學習理論主張，個人認為從事偏差行為可能有助於獲得同儕認同的預期獲益，或可能受到預期損失，分別是促使和抑制偏差行為持續出現的主要原因，但相關描述多詢問他人針對個人特定偏差行為的反應，如：同儕鼓勵你使用藥物的行為（正增強）、父母對使用藥物給予的懲罰（懲罰）(Akers, Krohn, Lanzakaduce, & Radosevich, 1979)，並未著重於個人對行為結果的預期獲益與損失評估歷程(Durkin et al., 2005; Wheatley, West, Charlton, Sanders, Smith, & Taylor, 2009; Winfree, Bäckstöm, & Mays, 1994)。由此可知，對於增強的測量題項，並未適切且完整地捕捉到個人對行為結果的預期獲益（正、負增強）和損失的評估歷程，而社會學習理論主張的「追求同儕認同」，可作為個人對偏差行為預期獲益的評估因素，至於一般化緊張理論和社會控制理論觀點，則可為偏差行為的負增強和損失，提供認知評估的標的，有助於建構相關測量的基礎，適切地捕捉到負增強與懲罰評估的歷程本質。

一般化緊張理論主張，對個人具有負向價值的人事物（如：失戀或課業壓力），也可能促使個人從事偏差行為(Agnew, 1992)，如：課業壓力可能導致個人透過翹課來逃避之，此即社會學習理論中所謂的負增強，但一般化緊張理論的測量卻未適切地捕捉到負增強的歷程本質。根據一般化緊張理論所進行的實徵研究，將具有負向價值的人、事、物稱為「負向生活事件」，個別測量題項內涵，是詢問個人是否遭遇到特定的負向生活事件，最後將個人在數十個特定負向生活事件上的得分加總(董旭英, 2003; Agnew, 1992; Agnew, Brezina, Wright, & Cullen, 2002; Agnew & White, 1992; Aseltine, Gore, & Gordon, 2000)。由此可發現，一般化緊張理論所描述的負向社會事件，可作為測量負增強的認知評估標的，但需更重視個人評估偏差行為結果是否有助於逃避負向生活事件，較能適切地強調負增強的歷程本質。

社會控制理論則主張，當個人認為從事偏差行為會影響同儕或父母的感受，或影響父母與個人的關係，便較不可能從事偏差行為，因此，對同儕或父母的依附，是抑制個人從事偏差行為的主因(Hirschi, 1969)。然而，對父母依附或同儕依附的測量，多著重於外在客觀事件的描述，如：我幾乎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父母(Agnew, 1991)、會問媽媽對重要事情的看法，或評估某種現況，如：我們班的同學相親相愛，猶如一家人(譚子文、張楓明, 2013)，非著重於個人從事偏差行為時，心中可能的損失評估歷程，如：如果我偷別人的東西，會讓父母感到傷心。

近年來，國外逐漸有少部分研究者注意到，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時，可能出現的社會獲益與社會損失評估歷程，如：從事偏差行為可以讓別人尊敬我（Cochran, Maskaly, Jones, & Sellers, 2017），但在測量上仍存在著以下問題，第一、對社會獲益評估的測量，只著重在「正增強」作用的描述，並未納入「負增強」作用的內涵。第二、對於社會損失評估的測量，只著重在行為結果對個人的影響，如：從事偏差行為讓我有罪惡感，而非描述個人可能評估行為結果對重要他人之感受的影響，如：從事偏差行為會覺得對不起父母。由於華人社會，相較於西方社會，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測量上，對社會損失評估的內涵描述，可參考社會控制理論之內涵，更著重在行為結果對親近他人的影響。第三、缺乏建構效度的證據。

綜上可知，雖然，個人對外在社會情境的內在心理評估機置，是影響個人行為表現的重要因素。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雖也承認社會情境可能誘發個人對獲益與損失的評估歷程，但過去研究在測量上，卻並未相對重視該歷程的測量，而是多偏重於外在社會情境因素的描述，或現況的評估，較少著重於探討個人對行為結果的社會益損評估歷程，也因此未能針對偏差行為的正增強、負增強與懲罰，進行較為適切的測量。近年來，雖有相關研究開始重視個人對行為結果的社會益損評估歷程，但同樣較忽略了對負增強的測量，對損失評估的測量也未重視到理論主張和東方文化中的社會關係，在評估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相關研究多疏於提供建構效度的證據，以至於過去研究針對益損評估的測量，是否能有效測量或捕捉到個人對偏差行為的益損評估歷程，仍未知。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與一般化緊張理論，同時考量正增強與負增強對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歷程之影響，並根據社會控制理論來建構適用於本土文化之社會損失評估歷程的測量內涵。最後，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瞭解該測量的建構效度，提供未來研究複驗、修訂與進一步探究相關議題的參考。

## 貳、研究方法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中市約2萬8千名14歲八年級學生為抽樣母群。在進行正式調查研究前，先以立意抽樣，選取26個班級，共794位八年級學生進行問卷預試。正式樣本則是採用系統性叢集抽樣，從全市1056個班級中隨機選出一個班級，最後以183個班

級，共5079位八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生有2549人，占總樣本數的50.19%，女生有2529人，占總樣本數的49.79%。

## 二、研究工具

### (一) 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

本研究編製之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內容經國內3位從事偏差行為相關研究多年的教授進行專家效度的檢核，並無建議刪題，包含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與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兩個分量表，分別將之說明如下。

#### 1. 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分量表

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與一般化緊張理論，從事偏差行為有助於建立與偏差同儕的正向關係或獲得同儕認同，及逃避負向生活事件所帶來的負向影響，皆為青少年對於偏差行為結果可能的獲益預期 (Agnew, 2005)，對青少年具有重要的正向價值，因此本研究將這些內涵納入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之測量題項中。原社會獲益評估分量表題項共12題，與同儕認同有關的獲益評估 (正增強) 題項有5題，包含：(1) 「雖然朋友會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但我很重視他們的意見」。(2) 「為了增進跟朋友的感情，我會跟他們一起翹課、飆車或到不良場所」。(3) 「為了融入朋友，我會跟他們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 (如：抽菸、喝酒或賭博)」。(4) 「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 (如：打架、飆車或刺青) 可以吸引同學的注意」 (於正式分析時刪除)。(5) 「要讓成績變好，作弊是最快的方式」 (於正式分析時刪除)。項目分析結果顯示，與同儕認同有關的獲益評估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為 .94，刪除各題後，信度係數皆下降，決斷值分析結果顯示， $t$  值介於 -60.66 ~ -42.41 ( $ps < .05$ )，調整後題目與總分相關則介於 .73 ~ .88，故在此階段先將各題保留。至於，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所帶來的獲益評估 (負增強) 有關的題項有7題，題項包含：(1) 「我會從事一些不被允許的活動 (如：打架或參加幫派) 讓別人不敢欺負我或瞧不起我」。(2) 「只要能夠忘記生活中不好的經驗 (如：失戀、父母離婚或分居、家人生病或去世、父母衝突)，採用不被允許的方式 (如：抽菸、喝酒、飆車、濫用藥物或傷害自己) 也沒關係」 (於正式分析時刪除)。(3) 「為了讓欺負我的人得到教訓，我會直接揍他」。(4) 「只要能達到父親或母親的要求，用不被允許的方式 (如：作弊) 也沒關係」。(5) 「要發洩我的壓力，透過破壞公物、翹課、飆車、到不良場所或打架是最直接的方式」。(6) 「逃家讓我不用面對父親或母親帶給我的壓力」。(7) 「為了忘記生活中的壓力，使用非法藥物、抽菸或喝酒是不錯的方

式」。項目分析結果顯示，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之獲益評估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為 .87，刪除各題後，信度係數皆下降，決斷值分析結果顯示， $t$  值介於-61.52 ~ -41.14 ( $ps < .05$ )，調整後題目與總分相關則介於 .62 ~ .74，故在此階段將題項全數保留。題項皆採李克特式4點計分，反應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序給予1~4分。

## 2. 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分量表

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則是指，個人因為「依附同儕」與「依附父母」，而進一步評估從事偏差行為可能導致的損失結果，對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與對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兩個向度各以3題量測之。與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有關的題項有3題，分別包含：(1)「做了不該做的事好朋友或同學會瞧不起我」。(2)「做壞事會破壞我跟好朋友或同學的關係」。(3)「我會在乎好朋友或同學對我行為的負面評價」(於正式分析時刪除)。項目分析結果顯示，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為 .81，刪除各題後，信度係數皆下降，決斷值分析結果顯示， $t$  值介於-204.75 ~ -85.70 ( $ps < .05$ )，調整後題目與總分相關則介於 .62 ~ .68，故在此階段將題項全數保留。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有關的題項包含：(1)「若做了不好的行為我會覺得對不起父母」。(2)「跟朋友一起做壞事會辜負父母對我的期待」。(3)「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會傷父母的心」等3題。項目分析結果顯示，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為 .83，刪除各題後，信度係數皆下降，決斷值分析結果顯示， $t$  值介於-132.03 ~ 4.75 ( $ps < .05$ )，調整後題目與總分相關則介於 .76 ~ .77，故在此階段將題項全數保留。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皆採李克特式4點計分，1~4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越認同偏差行為可能帶來負向的損失結果。題項採李克特式4點計分，反應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依序給予1~4分。

##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主要採用Mplus 7.0進行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之測量模式分析，並考量分析資料的巢套結構，也進一步評估進行多層次驗證性因素分析 (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CFA) 的必要性。由於多層次CFA測量模式的複雜度較高，直接設定多層次CFA模式進行分析容易導致模式誤設或參數估計時的收斂等問題 (Dyer, Hanges, & Hall, 2005; Heck & Thomas, 2009; Mehta & Neale, 2005; Muthén, 1994; Stapleton, 2013)。因此，本研究採逐步分析方法，先進行

單層測量模式分析，再進行MCFA，瞭解分析模式的適切性。

本研究先以探索性結構方程模式（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進行單層測量模式分析，這是由於ESEM，相較於傳統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可提供較為客觀的評估指標，並且當分析結果顯示2個以上因素為較佳的模式時，ESEM允許觀察變項出現跨因素負荷的情形，因此，ESEM與資料的適配度優於傳統CFA，且能夠更為正確的估計因素間的相關（Marsh et al., 2009）。由於目前僅少數國外實徵研究指出，ESEM結果優於CFA（Marsh, Nagengast, & Morin, 2013），證據仍不足，國內實徵研究結果為何仍未知，因此，本研究將進行傳統CFA與ESEM分析，並比較ESEM與CFA結果，選擇較適切的模式。此外，本研究也視分析結果，決定是否進一步實施二階ESEM，檢視多個一階因素之上是否有更高層次的因素，分別反應出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歷程。

對於測量模式整體適配度的評估，本研究採用 $\chi^2$ 、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CFI（comparative fit index）、TLI（Tucker-Lewis index）與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作為評估模式適配度的標準，並提供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與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值，作為後續模式比較的參考。其中，由於 $\chi^2$ 統計量容易受樣本數的影響，導致虛無假設被拒絕（Mehta & Neale, 2005），因此，本研究參考其他適配度指標來評估觀察資料與模式的適配情形。在這些其它的指標中，RMSEA值.06以下為優良（Hu & Bentler, 1999），.06~.08為可接受之範圍（Jöreskog & Sörbom, 1993），並根據90%信賴區間來判斷其值是否超過模式適配標準的最低要求（Hox, 2010）。CFI與TLI值介於.90~.95為可接受，.95以上代表模式適配度佳，1則為完美適配。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則是用來作為反映模式整體殘差的指標，當數值低於.08，表示模式適配度佳（Hu & Bentler, 1999）。此外，也採用CFI與TLI的差值（ $\Delta$ CFI與 $\Delta$ TLI），作為選擇較佳模式的依據。當較複雜的模式（如：二因素模式）與較簡單的模式（如：一因素模式）之間的 $\Delta$ CFI大於.01， $\Delta$ TLI大於.02時，便可認為較複雜的模式對於資料的解釋力有明顯的提升。反之，若較複雜的模式與較簡單的模式之間的 $\Delta$ CFI未大於.01， $\Delta$ TLI也未大於.02，則以較簡單的模式為佳（Elliot, Murayama, & Pekrun, 2011）。

對於模式的內在品質，是根據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個別指標信度、組合信度（CR）與平均變異抽取量（AVE）來判斷。當個別指標信度在.50以上（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09），組合信度大於.60（Fornell & Larcker, 1981），AVE高於

.50 (Bagozzi & Yi, 1988)，就表示模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此外，本研究以拔靴法估計潛在變項間相關係數的95%信賴區間，檢視因素間的區辨性。若相關係數的95%信賴區間未包含1，就表示因素間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別效度。

植基於良好的ESEM分析結果，將進一步根據各觀察變項的組內相關係數（ICC），來判斷是否進行MCFA。有研究者認為，當ICC小於.05時，就意謂著觀察值接近獨立，沒有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必要（Dyer et al., 2005; Heck & Thomas, 2009）。反之，當ICC大於.05則表示觀察資料呈現出相當程度的組內相關，可進一步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但有研究者指出，除了以ICC做為評估是否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參考指標外，更應考量設計效果（design effect）所產生的抽樣變異，對參數估計之統計檢定力的可能影響（Hox & Maas, 2001）。當設計效果小於2，即使採用單一層次分析方法來分析多層次資料結構也不至於產生過度偏誤的結果（Muthén & Satorra, 1995）。本研究以ICC值小於.05作為參考值，但主要仍以設計效果大於2，作為判斷是否進行多層次MCFA之標準。當設計效果大於2便進行MCFA，並根據 $\Delta CFI$ 、 $\Delta TLI$ 、AIC與BIC判斷模式的簡效性。

## 參、研究結果

### 一、預試結果分析

#### （一）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ESEM分析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之卡方值達顯著， $\chi^2(54, N = 794) = 141.28 (p < .05)$ ，RMSEA為.045（90% CI介於.036~.054），小於.06，CFI與TLI分別為.95與.94，SRMR則為.021。二因素模式之卡方值亦達顯著 $\chi^2(34, N = 794) = 78.60 (p < .05)$ ，RMSEA為.041（90% CI介於.029~.053）小於.06，CFI與TLI分別為.972與.955，SRMR則為.021。第1~7題負荷於因素一，因素負荷量分別為.28、.91、.87、.74、.82、.34與.28，第6~12題負荷於因素二，因素負荷量分別為.41、.36、.78、.76、.92與.85。其中，第1題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低於.50，而第6題與第7題則是因為同時負荷於兩個因素之上，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也低於.50，故將此三題刪除。修正後之二因素模式之卡方值達顯著 $\chi^2(34, N = 794) = 65.85 (p < .05)$ ，RMSEA為.032（90% CI介於.027~.037），低於.06之標準，CFI與TLI分別為.987與.979，SRMR則為.018。兩模式之 $\Delta CFI$ 大於.01， $\Delta TLI$

小於 .02，因此，應以二因素模式為佳。

## （二）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

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分量表題項得分，進行一因素ESEM分析的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不佳， $\chi^2(9, N = 794) = 199.86$  ( $p < .05$ )，RMSEA = .164，CFI與TLI分別為 .84與 .73。二因素模式的ESEM分析結果則顯示，觀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極佳， $\chi^2(4, N = 794) = 3.82$  ( $p > .05$ )，RMSEA = .000（90% CI介於 .000 ~ .053），CFI與TLI分別為1.00與1.00，SRMR = .007。二因素模式與一因素模式間的 $\Delta$ CFI大於 .01， $\Delta$ TLI大於 .02，顯示出二因素模式顯著優於一因素模式。分量表的第1、2、3題負荷於因素一，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76、.80、.35。第3、4、5、6題負荷於因素二，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41、.71、.94、.82。其中，第3題同時負荷於兩個因素上，且因素負荷量皆低，因此，本研究將第3題刪除，並將第1題與第2題設定負荷於因素一，而第4、5、6題設定負荷於因素二，再進行ESEM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該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佳， $\chi^2(4, N = 794) = 41.94$  ( $p < .05$ )，RMSEA = .052（90% CI介於 .041 ~ .063）；CFI與TLI分別為 .96與 .95，SRMR = .019，因素一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82與 .80，因素二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則分別為 .81、.90、.82，兩因素間之相關為 .42 ( $p < .05$ )。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為 .87。由結果可知，對依附關係的損失評估分量表的信度與效度良好。然而，為求問卷題項用語的一致性，本研究將部分題項中，原先提及之「不該做的事」與「壞事」等用語，修改為「不被允許的行為」或「不被允許的事」。

## 二、正式問卷基本分析

### （一）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表一呈現偏差行為結果評估分量表各題項的描述性統計量。從表一可知，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各題項（第1~9題）的得分皆低（ $M$ 介於1.21~1.42， $SD$ 介於 .51~.74），顯示出八年級學生普遍不認為從事偏差行為會帶來正向的結果。題項間的相關介於 .56~.84 ( $ps < .05$ )。

### （二）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

從表一亦可發現，八年級學生對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皆高（ $M$ 介於2.26~3.08， $SD$ 介於1.04~1.20），顯示出國中二年級學生普遍傾向於同意從事偏差行為會

帶來可能的損失。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各題項（第10~14題）間的相關介於 .44 ~ .87 ( $ps < .05$ )。

表一 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描述性統計量摘要

	<i>M</i>	<i>SD</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27	.58	-	.83	.78	.69	.58	.64	.71	.62	.69	<b>.03</b>	<b>-.02</b>	-.15	-.11	-.10
2	1.26	.57		-	.84	.75	.58	.66	.71	.63	.75	.03	<b>-.02</b>	-.16	-.11	-.11
3	1.24	.55			-	.73	.58	.68	.74	.64	.73	<b>.03</b>	<b>-.02</b>	-.16	-.12	-.11
4	1.26	.57				-	.58	.68	.74	.67	.76	.03	<b>-.01</b>	-.14	-.10	-.09
5	1.42	.74					-	.61	.66	.58	.56	<b>.02</b>	<b>.01</b>	-.10	-.09	-.06
6	1.28	.56						-	.76	.69	.71	.03	<b>-.01</b>	-.14	-.11	-.09
7	1.26	.56							-	.74	.75	<b>.02</b>	<b>-.02</b>	-.16	-.12	-.11
8	1.30	.61								-	.72	.03	<b>.00</b>	-.16	-.11	-.11
9	1.21	.51									-	.04	<b>-.01</b>	-.15	-.11	-.10
10	2.26	1.20										-	.74	.44	.47	.45
11	2.54	1.19											-	.55	.58	.56
12	3.08	1.04												-	.80	.79
13	3.00	1.08													-	.87
14	3.06	1.09														-

註：1 = 雖然朋友會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但我很重視他們的意見。2 = 為了增進跟朋友的感情，我會跟他們一起翹課、飆車或到不良場所。3 = 為了融入朋友，我會跟他們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如：抽菸、喝酒或賭博）。4 = 我會從事一些不被允許的活動（如：打架或參加幫派）讓別人不敢欺負我或瞧不起我。5 = 為了讓欺負我的人得到教訓，我會直接揍他。6 = 只要能達到父親或母親的要求，用不被允許的方式（如：作弊）也沒關係。7 = 要發洩我的壓力，透過破壞公物、翹課、飆車、到不良場所或打架是最直接的方式。8 = 逃家讓我不用面對父親或母親帶給我的壓力。9 = 為了忘記生活中的壓力，使用非法藥物、抽菸或喝酒是不錯的方式。10 = 做了不該做的事好朋友或同學會瞧不起我。11 = 做不該做的事會破壞我跟好朋友或同學的關係。12 = 若做了不好的行為我會覺得對不起父母。13 = 跟朋友一起做不該做的事會辜負父母對我的期待。14 = 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會傷父母的心。因表格空間擁擠，故在相關係數中，「非粗體」數字表示達 .05顯著水準之相關係數，「粗體」數字則表示未達 .05顯著水準之相關係數。

### 三、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單層ESEM分析

#### (一) 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進行ESEM分析的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尚可，模式卡方值達顯著， $\chi^2(44, N = 5079)$  為793.98 ( $p < .05$ )，RMSEA為.050 (90% CI介於.046 ~ .053)，其值小於.06，CFI與TLI分別為.93與.92，SRMR則為.031。二因素ESEM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極佳，模式卡方值達顯著， $\chi^2(34, N = 5079)$  為194.79 ( $p < .05$ )，RMSEA為.031 (90% CI介於.026 ~ .035)，其值小於.06，CFI與TLI分別為.98與.97，SRMR則為.015。二因素模式與一因素模式的 $\Delta$ CFI大於.01， $\Delta$ TLI也大於.02，由此可知，二因素模式為較佳的理論模式。

在二因素模式的各題項中，第1~3題負荷於因素一，因素負荷量分別為.73、.95與.71，第4~9題負荷於因素二，因素負荷量分別為.74、.72、.94、.88、.88與.71。根據題項之內涵，本研究將因素一命名為「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將因素二命名為「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

#### (二) 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

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之ESEM分析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不佳，卡方值達顯著， $\chi^2(9, N = 5079)$  為1631.65 ( $p < .05$ )，RMSEA=.188 (90% CI介於.181 ~ .196)；CFI與TLI分別為.83與.72，AIC與BIC分別為73080.12與73197.71。二因素模式的ESEM結果顯示，觀察資料與該模式適配度不錯，卡方值達顯著， $\chi^2(4, N = 5079)$  為69.10 ( $p > .05$ )，RMSEA為.057 (90% CI介於.045 ~ .069)；CFI與TLI分別為.99與.98，SRMR為.010，AIC與BIC分別為70207.65與70357.90。由結果可知，二因素模式顯著優於一因素模式。在各題項中，第1~2題負荷於因素一，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80與.94，第3~5題負荷於因素二，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83、.94與.93，分別將兩因素命名為「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與「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分別為.86與.93，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為.89。

#### 四、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單層CFA、一階ESEM與二階ESEM結果

##### (一) 單層CFA整體模式適配度

進一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的二因素與社會損失評估的二因素，所構成之四因素整體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卡方值達顯著， $\chi^2(71, N=5079)$  為450.11 ( $p < .05$ )，RMSEA為.032 (90% CI介於.030~.035)，其值小於.06，CFI與TLI分別為.978與.971，SRMR則為.022。模式的AIC與BIC分別為98894.65與99208.23。

##### (二) 單層ESEM整體模式適配度

ESEM結果顯示，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的二因素與社會損失評估的二因素，所構成之一階四因素整體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卡方值達顯著， $\chi^2(41, N=5079)$  為241.90 ( $p < .05$ )，RMSEA為.031 (90% CI介於.027~.035)，其值小於.06，CFI與TLI分別為.998與.974，SRMR則為.010。模式的AIC與BIC分別為98388.58與98898.15。從上可知，ESEM的分析結果顯示，ESEM在各項統計檢定與指標上的表現確實皆優於CFA的分析結果，因此，本研究根據ESEM結果進行後續分析。

根據ESEM結果，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兩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83，95%信賴區間介於.79~.87，未包含1，顯示兩因素的內涵有所不同。依附同儕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兩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63，95%信賴區間介於.58~.68，也未包含1，顯示兩因素的內涵亦有所不同。此外，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與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間無關，相關係數為.00 ( $p > .05$ )，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與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無關，兩因素的相關係數為.01 ( $p > .05$ )。至於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間有顯著的負相關，相關係數為-.15 ( $p < .05$ )，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也有顯著的負相關，兩因素的相關係數為-.14 ( $p < .05$ )。

##### (三) 單層二階ESEM整體模式適配度

本研究根據一階四因素ESEM模式，進一步設定二階ESEM模式，該模式由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兩個二階因素構成，社會獲益評估是由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兩個一階因素所構成，社會損失評估則是由依附同儕與依附父母損失評估此兩個一階因素所構成。本研究根據Morin與Asparouhov (2018)之建議，進行二

階ESEM模式設定與參數估計。

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模式卡方值達顯著， $\chi^2$  (71,  $N=5079$ ) 為151.16 ( $p < .05$ )，RMSEA為.015 (90% CI介於.012~.018)，其值小於.06，CFI與TLI分別為.995與.994，SRMR則為.027。模式的AIC與BIC分別為97988.62與98302.19。從上可知，二階ESEM的分析結果顯示，二階ESEM在各項統計檢定與指標上的表現確實皆優於一階ESEM的分析結果。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兩個二階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14 ( $p < .05$ )，95%信賴區間介於-.17~-0.11，未包含1，顯示兩因素有所不同。最後，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信度係數分別為.95與.99，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97。

#### (四) 內在結構適配度

表二呈現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兩量表內在結構適配度摘要。由表二可知，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下，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此一因素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74、.98與.72，潛在變項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86與.68，分別高於.60與.50的標準。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此一因素下，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72、.73、.92、.84、.84與.71，潛在變項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91與.64，分別高於.60與.50的標準。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因素下，對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之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77與.95，潛在變項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85與.75，分別高於.60與.50的標準。對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各題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81、.94與.93，潛在變項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92與.80，也分別高於.60與.50的標準。由此可知，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的內在結構品質良好，但還需進一步檢視ICC與設計效果，方能瞭解資料的巢套結構是否可能影響適配結果，以下進一步檢視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確認之。

#### 四、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

表三呈現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分量表各題項的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從表三可知，八年級學生在對接觸偏差同儕的獲益評估下之各題項的ICC皆不高(介於.030~.038)，低於.05，設計效果介於1.80~2.02，只有一個題項的設計效果大於2，其它2個題項的設計效果皆小於2。在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獲益評估因素下各題項的ICC皆不高(介於.028~.037)，低於.05，設計效果介於1.75~1.99，設計效果皆小於2。整體而言，八年級學生對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之相似性較低，因此，社會

獲益評估可視為單一層次之個人因素，沒有設定MCFA組間模式之必要。

從表三亦可知，八年級學生在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之各題項得分的相似性不高（ICC介於 .027 ~ .031），低於 .05，設計效果介於1.72 ~ 1.83，顯示出八年級學生在同儕依附之社會損失評估上的相似性較低，因此，該因素可視為個人層次因素；但在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中，各題項得分的ICC雖然也低於 .05（介於 .028 ~ .048），但設計效果卻大於2介於（2.12 ~ 2.29），顯示出八年級學生在父母依附關係的損失評估之相似性較高，可能同時存在著個人與脈絡層次變異。然而，MCFA模式與二階ESEM模式何者較適合用於解釋八年級學生對偏差行為結果的認知評估歷程，需進一步透過差異顯著性檢定結果來判斷。

表二 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摘要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	個別指標信 度	潛在變項的 組成信度 (CR)	平均變異抽 取量 (AVE)
社會獲益評估					
1. 追求同儕 認同的獲 益評估	Y1	.74*	0.55	.86	.68
	Y2	.98*	0.96		
	Y3	.72*	0.52		
2. 對逃避負 向生活事 件的獲益 評估	Y4	.72*	0.52	.91	.64
	Y5	.73*	0.53		
	Y6	.92*	0.85		
	Y7	.84*	0.71		
	Y8	.84*	0.71		
	Y9	.71*	0.50		
社會損失評估					
1. 對依附同 儕的損失 評估	Y10	.77*	0.59	.85	.75
	Y11	.95*	0.90		
2. 對依附父 母的損失 評估	Y12	.81*	0.66	.92	.80
	Y13	.94*	0.88		
	Y14	.93*	0.86		

註：\* $p < .05$

表三 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之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摘要

題項	ICC	DE
(一) 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		
1. 追求同儕認同的獲益評估		
(1)雖然朋友會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但我很重視他們的意見	.035	1.94
(2)為了增進跟朋友的感情，我會跟他們一起翹課、飆車或到不良場所	.038	2.02
(3)為了融入朋友，我會跟他們做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如：抽菸、喝酒或賭博）	.030	1.80
2. 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		
(1)我會從事一些不被允許的活動（如：打架或參加幫派）讓別人不敢欺負我或瞧不起我	.035	1.94
(2)為了讓欺負我的人得到教訓，我會直接揍他	.029	1.78
(3)只要能達到父親或母親的要求，用不被允許的方式（如：作弊）也沒關係	.033	1.88
(4)要發洩我的壓力，透過破壞公物、翹課、飆車、到不良場所或打架是最直接的方式	.029	1.78
(5)逃家讓我不用面對父親或母親帶給我的壓力	.028	1.75
(6)為了忘記生活中的壓力，使用非法藥物、抽菸或喝酒是不錯的方式	.037	1.99
(二) 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		
1. 對同儕依附的損失評估		
(1)做了不該做的事好朋友或同學會瞧不起我	.028	1.75
(2)做不該做的事會破壞我跟好朋友或同學的關係	.032	1.86
2. 對父母依附的損失評估		
(1)若做了不好的行為我會覺得對不起父母	.048	2.29
(2)跟朋友一起做不該做的事會辜負父母對我的期待	.042	2.12
(3)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會傷父母的心	.048	2.29

註：ICC = 組內相關係數；DE = 設計效果。

## 五、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MCFA結果

MCFA結果顯示，社會益損評估的MCFA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良好，卡方值達顯著， $\chi^2(74, N=5079)$  為473.01 ( $p < .05$ )，RMSEA為.033，CFI與TLI分別為.977與.970，組間與組內之SRMR分別為.023與.003，AIC與BIC分別為98864.83及99198.01。在模式的組內部分，對依附偏差同儕的獲益評估之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為.88、.93與.91。對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之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80、.71、.85、.89、.81與.85。對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該因素中，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78與.95；對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該因素中，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分別為.85、.94與.92。在模式的組間部分，對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該因素中，各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為1.00。將社會損失評估的MCFA結果，與二階ESEM結果相比，MCFA與二階ESEM兩者的 $\Delta CFI$ 大於.01（二階ESEM的CFI值較高）， $\Delta TLI$ 也大於.02（二階ESEM的TFI值較高），MCFA的AIC與BIC也都高於二階ESEM模式，且MCFA模式更為複雜，因此，仍以二階ESEM模式的簡效性較佳，是較適於解釋八年級青少年社會益損評估歷程的模式。

## 肆、結論與討論

過去，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和社會控制理論有關的實徵研究，在測量上，多著重於外在社會情境因素或某種現狀的描述，較少著重於探究個人從事偏差行為時，內在心理對於行為結果可能產生的社會獲益與損失的評估歷程。本研究修正相關實徵研究在測量上的不足，參考社會學習理論觀點，捕捉青少年追求同儕認同之社會獲益，使其行為獲得正增強的歷程，並考量社會學習理論相關實徵研究，較少或並未適切的測量負增強歷程，因此，本研究參考一般化緊張理論的觀點，以逃避負向生活事件可能帶來的社會獲益，捕捉負增強歷程。此外，本研究也修正社會控制理論與相關實徵研究的測量，更著重在與同儕和父母等重要他人有關的社會性損失評估歷程上。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參考相關理論內涵作為建立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歷程的測量工具，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良好，因素間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別性，顯示出本研究編製的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與建構效度，二階ESEM模式為較佳的測量模式，可作為未來測量八年級青少年做行為決策時的社會益損評估歷程之參考。本研究在最後，也

釐清了青少年對社會獲益或社會損失的評估歷程，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個別差異，其相似性不高，且社會獲益與社會評估彼此間具有消長的關係。

研究結果清楚顯示，在社會獲益評估歷程中，青少年可能透過從事偏差行為，來獲得同儕的認同，使該行為獲得正增強，也有可能透過從事偏差行為來逃避負向生活事件所帶來的不愉快和壓力，使該行為獲得負增強。社會獲益評估歷程中的正增強與負增強歷程，有所不同，但存在著高度正相關，這可能意謂著，當青少年越認同透過從事偏差行為有助於獲得同儕認同，就越可能認為透過此類行為有助於逃避生活中的負向事件。

對於社會損失的評估歷程來說，研究結果也明確顯示，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兩者具有相當程度的區別性，但也存在高度相關，這可能意謂著在從事偏差行為時，越會在意該行為可能會讓重要的同儕朋友感到難過的青少年，也越可能考量從事偏差行為可能帶給父母的負向感受。從研究結果也可發現，社會學習理論主張的差別增強，可能並非單面向的構念，突顯出過去相關研究對於差別增強的測量上可能有疏漏而未納入測量的面向，如：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以及對依附重要他人的損失評估（Akers et al., 1979; Cochran et al., 2017; Durkin et al., 2005; Higgins & Tewksbury, 2007; Lilly et al., 2007; Pratt et al., 2010; Ward & Gryczynski, 2009）。

有趣的是，從社會獲益評估與社會損失評估的潛在變項間的相關可發現，「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兩者皆與「依附同儕」的損失評估歷程無關，對於評估行為結果對同儕和自我的感受來說，獲益評估與損失評估可能是獨立的心理歷程。但是，「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獲益評估，兩者皆與「依附父母」的損失評估歷程呈顯著負相關，這可能意謂著，當青少年越認同偏差行為有助於獲得同儕認同逃避負向生活事件，使其行為分別獲得預其結果的正增強與負增強時，越少考量行為結果可能對父母感受產生的影響，顯示出，同儕認同和個人遭遇到的負向事件或感受，是偏差行為的「推力」，而對父母的依附，才是偏差行為的「拉力」，較強的推力會削弱拉力對偏差行為的抑制效果，促使偏差行為產生，至於較強的拉力，可能有助於抑制推力的作用，減少偏差行為出現的可能。此一研究發現，與近年來學者認為的觀點相符，亦及偏差行為的出現是推力與拉力兩個作用力相互消長的結果，當偏差行為的推力大於拉力，便可能出現偏差行為，而拉力大於推力，則能抑制偏差行為的出現（Akers & Sellers, 2009）。

## 伍、研究限制與建議

###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主要有三。首先，本研究受限於研究人力、物力與財力等限制，難以同時納入多個縣市，且相關研究並無證據顯示，本研究探討之社會益損評估歷程，具有城鄉差異，或會因為學校規模而有所不同，因此，在抽樣上也並未考量城鄉因素與學校規模並根據各學校規模進行等比率之機率抽樣，故在抽樣上，本研究僅針對同一區域之學校，採用系統性叢集抽樣，以利研究的順利進行。再者，必須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雖於事前進行隨機抽樣，但由於各學校認為本研究結果對各校諮商輔導工作具有重要性，因此，主動額外邀集學生來填答問卷，導致樣本人數增加，據此產生的取樣偏差，建議未來研究需多加注意，以避免可能的偏誤產生。最後，青少年從事偏行為背後涉及複雜的認知評估歷程，雖然本研究採用過去相關研究的理論觀點，將之概分成社會獲益與社會損失評估歷程，並以社會心理學理論建構其內涵，但恐仍有疏漏之處。

### 二、研究建議

#### （一）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由於，外在社會情境因素，並不必然導致偏差行為，或有助於抑制偏差行為的出現，相較之下，當個人預期行為結果可能有助於得到預期的獲益，較可能促使個人從事偏差行為，或者，當個人預期行為結果可能影響重要他人（由其是父母）的感受，對偏差行為可能具有較大的抑制作用。因此，未來相關研究在針對相關理論所進行的測量上，可將測量重點，更聚焦於個人對於行為結果可能招致的獲益和損失歷程的評估，而本研究提供未來研究在探討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背後可能出現的認知評估歷程時，可供參考的依據。

雖然，本研究參考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的內涵，編製了偏差行為的社會益損評估量表，並初步提供了信度與效度證據，供未來研究參考，但未來相關研究，在測量的內涵方面，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獲益評估，除了可能包含「追求同儕認同」與「逃避負向生活事件」的相關測量題項外，也可考慮在測量題項中納入其他的理論內涵。同樣的，針對偏差行為的社會損失評估，也有納入其他理論題項的可能。因此，未來研究可考慮納入其他理論變項，與原測量模式進行模式比較，瞭解何種模式試解釋該心理歷程較佳的理論模式。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本量表

的測量焦點在於「社會獲益」與「社會損失」的評估，因此，在本質上，並不適合將自我控制理論等個人特質變項納入測量題項中。

此外，未來研究也可參考本量表，進一步探究社會益損評估對不同偏差行為的影響。或以此評估歷程為中介變項，探討社會益損評估在社會情境因素對偏差行為影響關係中的中介效果。最後，由於當前並無證據探究社會益損評估歷程的城鄉差異，也未檢視就讀於不同學校規模的青少年，在該評估歷程上的差異，因此，未來研究可在抽樣上，考量城鄉因素與學校規模，進一步探究上述議題。

## （二）實務上的建議

由於，本研究是著重於認知焦點的測量，研究結果初步發現，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背後，可能的獲益與損失評估歷程，在教學實務上，教師可針對這些認知焦點，如：認為從事偏差行為有助於增進與朋友之間的感情，或有助於忘記生活中的壓力，一一向青少年釐清，讓青少年瞭解，增進朋友間的感情，或獲得同儕的認同，也可透過其它正向方式來達成。至於面對生活上的壓力，也可透過其它正當且健康的方式來加以紓發。期望能透過此種方式，有效減少偏差行為的心理推力。

另一方面，教師除了應了解青少年在家與父母的相處狀況，和親子關係外，也可考慮在課程中設計更多家庭或親職教育活動，讓青少年在更多方面有更多同理父母心裡感受的機會，以增強偏差行為的心理拉力。更重要的是，推力的削弱與拉力的陶養應並重，方能對青少年的行為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 參考文獻

- 吳中勤（2015）：探究青少年憂鬱與偏差行為的歷時性的影響關係。《教育理論與實踐學刊》，32，71-104。[Wu, C. C. (2015). Investigating the longitudinal effects between juvenile depression and deviance.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32, 71-104.]
- 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呂豐足、洪千涵、白鎮福（2015）：103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4犯罪趨勢關鍵報告。《犯罪防治研究專刊》，7，3-15。[Sheu, C. J., Chen, Y. S., Tsai, T. M., Lu, F. Z., Hung, C. H., & Pei, C. F. (2015). 2014 crime situations and analyses--Crime trend reports. *Journal of Criminal Prevention*, 7, 3-15.]
- 許春金、謝文彥、蔡田木、呂宜芬、游伊君（2016）：104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15犯罪趨勢關鍵報告。《犯罪防治研究專刊》，11，4-20。[Sheu, C. J., Hsieh, W. Y., Tsai, T. M., Lu, Y. F., & Yu, Y. C. (2016). 2015 Crime situations and analyses - Key report on crime trend. *Journal of Criminal Prevention*, 11, 4-20.]

- 許春金、周文勇、蔡田木（1996）：男性與女性少年偏差行為成因差異之實證研究。犯罪學期刊，**2**，1-14。[Sheu, C. J., Chou, W. Y., & Tsai, T. M. (1996). Gender differences in causa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 1-14. doi: 10.29607/ZHWHGX.199612.0001]
- 許春金、蔡田木、鄭凱寶（2012）：青少年早期偏差價值觀與偏差友伴接觸對犯罪變化影響研究。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4**（2），109-138。[Sheu, C. J., Tsai, T. M., & Cheng, K. P. (2012). A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adolescents early deviant values and association with deviant peers in longitudinal crim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Delinquency and Prevention*, *4*(2), 109-138. doi: 10.29751/JRDP.201212.0004]
- 董旭英（2003）：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實證性檢驗。犯罪學期刊，**6**，103-128。[Tung, Y. Y. (2003). Test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Criminology*, *6*, 103-128. doi: 10.29607/ZHWHGX.200306.0004]
- 譚子文、張楓明（2013）：依附關係、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6**，67-90。[Tan, T. W., & Chang, F. M. (2013).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s among attachment, low self-control,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6*, 67-90.]
- 衛生福利部（2014）：103年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一少年篇。取自[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FilePath=~/File/Attach/5961/File\\_169263.pdf](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FilePath=~/File/Attach/5961/File_169263.pdf)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4).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life conditions in 2014 – A chapter for adolesc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FilePath=~/File/Attach/5961/File\\_169263.pdf](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FilePath=~/File/Attach/5961/File_169263.pdf)]
- 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檳（2017）：臺灣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之縱貫性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8**（3），399-426。[Lai, H. M., Cheng, P. W., & Chen, C. P. (2017).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epressive mood and deviant behavior in taiwanese adolesc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8*(3), 399-426. doi: 10.6251/BEP.20160308 ]
- Agnew, R. (1991). A longitudinal test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8*(2), 126-156.
- Agnew, R.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1), 47-88. doi: 10.1111/j.1745-9125.1992.tb01093.x
- Agnew, R. (2005). *Why do criminals offend?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Los Angeles, CA: Roxbury Publishing Co.
- Agnew, R., Brezina, T., Wright, J. P., & Cullen, F. T. (2002). Strai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elinquency: Extend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inology*, *40*(1), 43-72. doi: 10.1111/

- j.1745-9125.2002.tb00949.x
- Akers, R. L., & Jensen, G. F. (2006).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crime and devianc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F. Cullen, J. P. Wright, and K. R. Blevins. *Taking Stock: The Status of Criminological Theory. Advance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y* (Vol. 15, pp. 37-76).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Agnew, R., & White, H. R. (1992).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inology*, *30*(4), 475-500. doi: 10.1111/j.1745-9125.1992.tb01113.x
- Akers, R. L., Krohn, M. D., Lanza-kaduce, L., & Radosevich, M. (1979). Social learning and deviant behavior: Specific test of a general-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 636-655. doi: 10.2307/2094592
- Akers, R. L., & Sellers, C. S. (2009).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 Aseltine, R. H., Gore, S., & Gordon, J. (2000). Life stress, anger and anxiety, and delinquency: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1*(3), 256-275. doi: 10.2307/2676320
-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6*(1), 74-94. doi: 10.1007/BF02723327
- Burnett, S., Bault, N., Coricelli, G., & Blakemore, S. J. (2010). Adolescents' heightened risk-seeking in a probabilistic gambling task. *Cognitive Development*, *25*(2), 183-196. doi: 10.1016/j.cogdev.2009.11.003
- Cochran, J. K., Maskaly, J., Jones, S., & Sellers, C. S. (2017).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s to model Aker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with data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rime & Delinquency*, *63*(1), 39-60. doi: 10.1177/0011128715597694
- Defoe, I. N., Dubas, J. S., Figner, B., & van Aken, M. A. G. (2015). A meta-analysis on age differences in risky decision making: Adolescents versus children and adul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1), 48-84. doi: 10.1037/a0038088
- Durkin, K. F., Wolfe, T. W., & Clark, G. A. (2005). College students and binge drinking: An evaluation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Sociological Spectrum*, *25*(3), 255-272. doi: 10.1080/027321790518681
- Dyer, N. G., Hanges, P. J., & Hall, R. J. (2005). Applying 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echniques to the study of leadership.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6*(1), 149-167. doi: 10.1016/j.leaqua.2004.09.009
- Elliot, A. J., Murayama, K., & Pekrun, R. (2011). A 3 × 2 achievement goal mode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3*(3), 632-648. doi: 10.1037/a0023952

-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doi: 10.2307/3151312
- Hair J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 Anderson, R. E. (200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7th ed.). New Jersey, EC: Pearson.
- Heck, R. H., & Thomas, S. L. (2009).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level modeling techniques*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iggins, G. E., Tewksbury, R., & Mustaine, E. E. (2007). Sports fan binge drinking: An examination using low self-control and peer association. *Sociological Spectrum*, 27(4), 389-404. doi: 10.1080/02732170701313472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x, J. J., Moerbeek, M., & van de Schoot, R. (2010). *Multilevel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ox, J. J., & Maas, C. J. M. (2001). The accuracy of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pseudobalanced groups and small sampl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8(2), 157-174. doi: 10.1207/S15328007SEM0802\_1
-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doi: 10.1080/10705519909540118
- Jöreskog, K. G., & Sörbom, D. (1993). *LISREL 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SIMPLIS command language*. Chicago, IL: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 Kempf-Leonard, K., Tracy, P. E., & Howell, J. C. (2001). Serious, violent, and chronic juvenile offenders: The relationship of delinquency career types to adult criminality. *Justice Quarterly*, 18(3), 449-478. doi: 10.1080/07418820100094981
- Lilly, J. R., Cullen, F. T., & Ball, R. A. (2007). *Criminological theory: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4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arsh, H. W., Muthen, B., Asparouhov, T., Ludtke, O., Robitzsch, A., Morin, A. J. S., & Trautwein, U. (2009).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tegrating CFA and EFA: Application to students' evaluations of university teach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6(3), 439-476.
- Marsh, H. W., Nagengast, B., & Morin, A. J. S. (2013).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big-five factors over the life span: ESEM tests of gender, age, plasticity, maturity, and la dolce vita effec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6), 1194-1218. doi: 10.1037/a0026913
- Mehta, P. D., & Neale, M. C. (2005). People are variables too: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s

- modeling. *Psychological Methods*, 10(3), 259-284. doi: 10.1037/1082-989x.10.3.259
- Morin, A. J. S., & Asparouhov, T. (2018). *Estimation of a hierarchical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SEM) using ESEM-within-CFA*. Montreal, QC: Substantive Methodological Synergy Research Laboratory.
- Muthén, B. O. (1994). Multilevel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2(3), 376-398. doi: 10.1177/0049124194022003006
- Muthén, B. O., & Satorra, A. (1995). Complex sample data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25, 267-316. doi: 10.2307/271070
- Pratt, T. C., Cullen, F. T., Sellers, C. S., Winfree, L. T., Madensen, T. D., Daigle, L. E., ... Gau, J. M. (2010).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 meta-analysis. *Justice Quarterly*, 27(6), 765-802. doi: 10.1080/07418820903379610
- Stapleton, L. M. (2013).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complex sample data. In G. R. Hancock & R. O. Mueller. (E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second course* (pp. 521-562).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Ward, B. W., & Gryczynski, J. (2009).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effects of living arrangement on heavy alcohol use: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 70(3), 364-372. doi: 10.15288/jsad.2009.70.364
- Wheatley, R. K., West, R. P., Charlton, C. T., Sanders, R. B., Smith, T. G., & Taylor, M. J. (2009). Improving behavior through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A praise note system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 and Treatment of Children*, 32(4), 551-571. doi: 10.1353/etc.0.0071
- Winfree, L. T., Bäckstöm, T. V., & Mays, G. L. (1994). Social learning theory,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and youth gangs: A new twist on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Youth & Society*, 26(2), 147-177. doi: 10.1177/0044 118X94026002001

收件日期：107年08月07日

複審一日期：107年09月15日

通過日期：107年11月30日

##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the Scale for Social Benefits and Losses of Deviant Behaviors

Chung-Chin Wu\*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Social Learning Theory, General Strain Theory, and Social Control Theory are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theories, which proposed to account for deviant behavior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rgued that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behaviors, definition in favor of crime, the imitation of criminal models, and attached to deviant peer are four key influential factors leading to deviant behaviors. Deviant behaviors could be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encouraged to be prolonged. For instance, someone who initially smokes may be encourage for his/her brave, and it may be also thought that is the way keeping his/her friendship. How people define certain behaviors as good or bad may be decided by his or her propensity of committing criminality. Moreover, deviant peer may also provide a model for imitating their deviant behaviors. Further, people who attaches to deviant peer may also learn deviant motivation and definition. General Strain Theory argued that failure to achieve positively valued goals (e.g. did not get good grade), inconsistent between expectations and achievements, removal of positive stimuli (e.g. divorce), and appearance of negative stimuli (e.g. been bullied) are crucial for deviant behaviors. Both theories try to find out encouraged factors for deviant behaviors. Instead, Social Control Theory proposes that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viduals, commitments, values, norms, and beliefs prevents someone from deviant behaviors. Therefore, if moral beliefs (what is this?) are internalized, people will voluntarily limit their intention to commit deviant behaviors. This theory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factors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deviant behaviors. However, measurement of these three theories were rarely investigated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benefits and losses for expected behavioral outcom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negative reinforcement to deviant behaviors and inhibition effects of deviant behaviors to others feeling (social losses) were rarely measured in related measurement in empirical studie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social benefits evaluation items based on Social

---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ung-Chin Wu, e-mail: [minin-72704@yahoo.com.tw](mailto:minin-72704@yahoo.com.tw)  
doi: 10.3966/172851862019050055004

Learning Theory and General Strain Theory to respectively capture positiv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inforcements on deviant behaviors. Meanwhile, items for measuring social losses, based on social control theory, were designed to capture inhibition effects of affective connections to important others on deviant behaviors. This study included eighth grader as participants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social benefits and losses scale. Results showed: (1) Model of two second-order factors consisting four factors fitted to the observations. (2) Social benefits evaluation processes included pursuing peers' recognition and avoi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3) Social losses evaluation processes included losses evaluation for attached to peers and parents. (4) "Pursing peers' recognition" and "avoi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were considered as driving force, and there was only "attached to parents" was considered as pull force for inhibiting deviant behaviors. Results clearly showed that in evaluation process of social benefits, adolescence may try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peers by means of committing deviant behaviors. It was also possible that they tried to unpleasure and pressure accompanied by avoi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throughout engaging in deviant behaviors. As to social losses evaluation process, loss evaluation of attachment to peer and parents were clearly different. Adolescence who considered more about peers' thought were more likely to consider parents' negative feeling.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urther researches could not only re-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is scale, but also could incorporate other theoretical variables to examine the fitness to the data. In practical,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conduct various 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evaluation foci of social benefits and social losses, to weaken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iant behaviors and reinforce the pull force to inhibit deviant behaviors.

**Keywords: Deviant behaviors, social benefits, social losses.**

